

■ 院士述學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范雲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採訪
- 劉素芬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採訪
- 江淑琳 整理

人生與學術的 歷史之旅

訪劉翠溶院士



問：您的學思歷程很有趣，您為什麼會從經濟史到人口史，然後走到環境史？您基本上對歷史的問題意識與關懷跟許多歷史學者並不太一樣，您要不要先談談這方面？

答：我一開始從大學時，就是比較偏經濟史的。早期的學士也是要寫論文，但是到我們那個時代已經不用寫論文了，不過我還是選擇寫了論文。我大學時候寫的論文是漢朝的商業，是學士論文，根本就是練習，所以沒有出版。大學時代我念了不少上古史的東西，那時候李宗侗先生教我們上古史，我大四的

時候，許倬雲先生從芝加哥回來教書，我是他的第一班學生，所以我就寫了一篇與漢朝經濟有關的論文。大學時代我就對經濟史有興趣。

進了研究所，我還是決定繼續做經濟史方面的研究，那時候也是在許倬雲先生的推薦下，到史語所來整理那些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案。我一邊整理，一邊看到很多資料，覺得很有意思，也跟財政有關，所以碩士論文我就寫清朝初年的財政問題、國家的稅收與支出問題，用了很多當時我們整理的檔案資料。後來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幫我出版碩士論文，《順治康熙年間的財政平衡問題》。

就是這樣一路下來，碩士班畢業之後又到史語所工作兩年，後來才去哈佛大學。到哈佛大學之後，我還是繼續做經濟史。我會改做人口學也是因為我從哈佛回來以後不能回到史語所，所以我就到美國文化研究所（編者按：現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我在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回來，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到夏威夷東西中

心參加一個研討會，是一個月的研討會。是經濟所劉克智先生推薦我去的。當時經濟所的所長是于宗先先生，他們對經濟史的研究都滿有興趣的，又知道我回來，而那時費景漢先生剛好回國開院士會議，想找人合作研究經濟史，于宗先先生就推薦我和費先生合作。

一九七五年我參加夏威夷東西中心的人口研討會，是因為人家請劉克智先生推薦，所以那年台灣有好幾個人去參加，除劉克智先生和我之外，還有黃大洲、張曉春、陳芳蕙。我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參加了夏威夷東西中心的研討會，學習基本的人口學理論和方法，從此開始接觸人口學，當時是很密集(intensive)的訓練。

經由劉克智先生的推薦，我在一九七六年又去了賓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做十個月的博士後研究。當時教歷史人口學的是一位研究比利時歷史人口的學者 Etienne van de Walle。我選他的課，學習歷史人口學的研究方法。此外，我在那時也學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

當時，我在賓大圖書館找到兩部台灣的族譜，不過因為大部份早期的族譜沒有生卒年月日，對於要做人口學的研究者而言並不好用。我當時找到兩部大致上生卒年月日記載較為詳細的台灣族譜，便寫了我的第一篇歷史人口學的文章。

做中國歷史人口研究一定要有族譜才行，因為中國不像歐洲有教區記錄。那時只有中央圖書館(編者按：現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收藏一些族譜，但大部分是台灣族譜，沒有詳細記錄生卒年月日，不好用於歷史人口之研究。

於是在從賓州回來之前，我到哈佛燕京圖書館挑了一些記錄較好的族譜來做 microfilm(微捲)。雖然哥倫比亞大學收藏更多的族譜，因為我跟哥大不熟，所以我就去哈佛燕京圖書館找資料。

當時還沒有個人電腦，我都是用那種要打洞的卡片，自己寫一些簡單的程式到電腦中心去用大電腦跑資料。一開始中研院也只有大的電腦，過幾年才有個人電腦，之後我才轉到個人電腦上來做。而且當時也沒有什麼軟體，所以我就自己硬學，學一些基本的計算軟體，像DBASE III，還是要寫程式計算，寫 fortran 程式，總算可以利用 data 做一些歷史人口的統計。

我在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國文化研究所，不久，于宗先先生希望我轉到經濟所，所以我就到經濟所。我在經濟所繼續跟費景漢先生合作研究，都是趁費先生回國時一起研究。我申請到國科會的計畫支持，就由幾個助理幫我把一筆一筆資料由中國的紀年轉為西曆，鍵入資

料，慢慢完成五十個族譜的資料。我剛開始起是一篇一篇寫，寫一個家族或兩個家族的單篇論文，後來再寫成一本書，最後由經濟所幫我出版，書名是《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變遷》。

至於我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漢江流域研究，題目是《Trade of the Han River》。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幫大家出版博士論文，我的論文就是這樣出版的。

我碩士畢業後，先到史語所工作兩年，當助理研究員。一九六六年碩士畢業，研究明清史，一九六八出國到哈佛大學念六年，修博士學位。我在哈佛也是念中國史，尤其是宋以後的中國史。當時學科考試，我的program要考三個領域，其中一個必須是西洋史。我考的是中國史從宋朝以後分兩成大段，西洋史我選擇西洋經濟史。

當時我的指導教授是楊聯陞（蓮生）先生，他問我想做什麼題目，我說我要研究經濟史。至於歐洲的field要做什麼呢？楊先生對我說，大多數中國學生都是考歐洲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因為歷史系教歐洲思想史的Hughes教授比較體諒外國學生。我說我想考經濟史，但他說從來沒有人考這個領域，所以我就硬著頭皮到經濟系去選修Alexander Gerschenkron教授為經濟系研究生開的經



濟史課，上了一年的課。當時跟我一起選課的還有一位韓國學生。老師給我們的成績是B，還好沒有給我們C。Gerschenkron教授一開始就對大家說，他認為學期報告(term paper)要寫到可以出版(publishable)的程度，才可以拿到A。他給我們很多reading。此外，我也去歷史系聽David Landes教授的歐洲史，並跟他念一個reading的課，定期去向他報告閱讀的情形。

哈佛的學科考不是考筆試，而是用口試，所以要念不少東西。我第一次考沒有過，他們就說沒關係再考一次，Fairbank（費正清）教授也是我的committee之一，他知道我整天在圖書館裡看書，很少與人交談，他便為我找一位在東亞中心(East Asian Center, 後來改稱Fairbank Center)工作的學者，常常去跟他練習講英語。一年之後，我又重新考一次學科考，考過之後就寫論文了。

當時我跟楊先生說，我想做漢中漢水上游一帶與相關地區的貿易，他覺得這個題目不錯，他說有一本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可以參考，我就去找來看，並找相關資料來寫這篇論文，我還用地方志跟海關資料。寫博士論文還算順利，哈佛的博士論文不必口試，只要寫好了，委員認為可以就可以了。我有一位同學幫我順英文。

哈佛畢業之後，在我要回台灣之前，去向Fairbank教授辭行，他對我說，我的論文可以立刻出版(publish right away)，要我去問哈佛燕京社有沒有可能出版，但對方說比較困難。我想沒關係就帶回來台灣，所以我的博士論文是到中研院經濟所才出版的。

我在哈佛那幾年，到歷史系念了一些西洋經濟史、中國史、日文等，因為日文是密集(intensive)的課程，每周上課十小時之外，還要去語音教室聽錄音練習，上課時要對答如流，不然會過不了。當時學得很緊張，現在讀還可以，到日本去，簡單的可以聽，不過忘得差不多了，說還是不行。

我的學思歷程大概就是這樣。歷史人口學花了我十幾年的時間研究。我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到台大開一門課，最初是教中國近代經濟史，後來開過兩次歷史

人口學導論。環境史研究選讀則是前年第一次開，今年第二次開。

問：台灣研究環境史的時間與西方相較是否較晚起步？

答：對，中國學界還是慢了一點，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西方就已經開始做環境史，但當時還沒有人談到要研究中國環境史，我還在哈佛時，並沒有聽說過有人要做環境史。

我在一九九一年開始做環境史研究。有一位澳洲國立大學的Mark Elvin(伊懋可)教授是第一個為中國環境史提出一個agenda的人，他的文章在一九九〇年發表。當時他向蔣經國基金會提出計畫，想找人一起做，蔣經國基金會就找我，問我要不要一起做，我就說好，我們分別做研究，他做中國大陸部份，因為他本身是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相當有名的學者，我做台灣的部份。蔣經國基金會後來通過我們想開研討會的提案。

我們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個中國生態環境史的研討會，大部分的人都是伊懋可教授召集的。至於台灣的部分，由於一九九一年就向國科會提一個兩年的研究計畫，由經濟所的同仁包括我在內共六人一起做，計畫共有六個子題。國科會給我們兩年時間，

我們做到一九九三年就去香港開會，我們六個人有一位在第二年退出，所以就五個人去開會。一九九三年的會議是用英文寫論文和討論，會後我找學生做中文翻譯，再由我潤飾。論文集的中文版是在一九九五年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出版，英文版是在一九九八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問：過去歷史研究的對象都是以帝王將相居多，您由下而上研究民間歷史，再到環境史，請您談談歷史研究對象改變的歷程。

答：過去歷史研究只注重人的部分，不重自然環境，就算有也是把環境當背景附帶一提而已。現在則是要看人的行為如何影響自然，並回過頭來再影響到人，也就是人與自然的互動過程與結果。歷史學家研究問題要靠資料，不管是做 intellectual history 或是其他領域都是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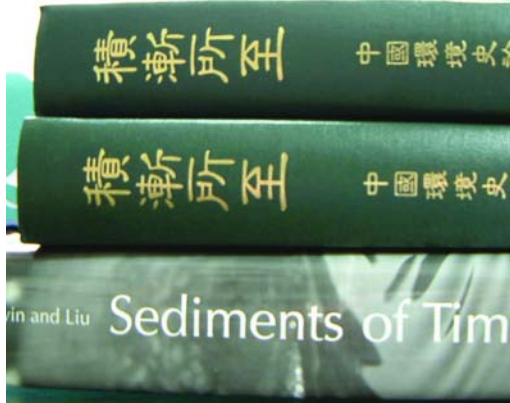
我曾經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歷史上關於山林川澤的觀念與制度》的文章，就是從中國固有的史料中找出與環境史有關的資料來討論。不管是美國的 Donald Worster 教授或是 Mark Elvin 教授，都認為歷史學家還是要學一些自然科學。一九六〇年代時，許倬雲先生就要歷史學家注意社會科學，但有一派就是不信任任何理論，我不是責怪他們，我也不認為

歷史研究一定要從理論架構開始，而是研究相關的資料後，可以歸納得到一些通論，歸納與演繹是並行不悖的。

環境史與人文地理是很有關係的，不管是西方或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家，在他們的研究裡，環境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歷史學家過去沒有那樣重視環境，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才開始重視。歷史研究應有跨學科的研究才會做的比較好，所以我鼓勵學生要學歷史以外的學科來輔助自己的研究。

問：您晚近的研究領域轉到台灣史來，請談談這個過程。

答：沒辦法啊！一九九一年我開始做台灣的研究，我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做了好幾年的環境史，後來李遠哲院長（編者按：中央研究院院長）要我擔任台史所主任。不過對我而言只是注重的焦點不一樣而已。要把史實都弄清楚是最重要的。台灣史有它獨特的地方，台灣在短短幾百年內經歷不同的政權統治，也受到被外國殖民的經驗，所以台灣史的意涵相當豐富。台灣雖然地方小，但清朝早期的開發也是到邊區，所以也是有比較的可能性。此外，台灣殖民時代的歷史也可以與有被殖民經驗的地方做比較，例如與荷蘭、英國、日本的殖民地做比較，這類比較現在很欠缺，值得花心思去做。



一九五〇年代以後的台灣史還是很少人碰，只有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歷史更少人做。做當代歷史一定要懂社會科學，所以要做當代歷史，更需要有好的社會科學訓練，否則當代歷史的研究也不可能做得很好。例如，如果不懂經濟學，根本看不懂經濟學家在做什麼，看不懂他們對當代經濟問題的看法，也就難以做當代的經濟史。早期的歷史可以只從歷史文獻去看，但社會科學發達之後，如果沒有社會科學的輔助，會很難處理當代歷史的問題。

問：您的歷史研究領域從經濟到人口再到環境，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障礙呢：

答：我沒有遇到很大的障礙與困難。這些領域只是處理的題目不一樣，題目不一樣就找相關的材料做研究，歷史研

究本來就是這樣子。我現在做台灣史，就不能夠照顧到中國史，因為時間不夠，加上又擔任行政工作。

問：經濟學背景出身與歷史學背景出身，在做經濟史上有何不同？

答：應該不會有很大差別。有很多資料要處理時，經濟系學生在選擇經濟模型上較有利，但真正要寫好經濟史的作品還是要適當處理好史料。我在台大經濟系開過兩年的課，但成效不好。因為經濟學家有太多出路，不會想做經濟史。

在台灣做經濟史的人不多，經濟史還是不太受學生的喜歡，即使我在台大開經濟史、人口史、環境史，但選課的人都不多，因為大家怕念我給的很多reading，歷史系學生很少人想要把該學的社會科學領域努力學好，他們有這樣的障礙。所以經濟史的學生總是不多，我要他們好好念經濟學與統計學，否則無法掌握。

台大歷史研究所前年畢業兩個碩士生，朱瑪瓏跟顧雅文算是企圖做環境史的。前者寫的是颱風的問題，後者寫的是彰化八堡圳的開發。朱瑪瓏的題目是《近代颱風知識的轉變--以台灣為中心的探討》，顧雅文則是《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

問：您要不要給往後做歷史研究的人一些建議呢：

答：我都讓學生做自己想做的題目，我的學生做貿易史的比較多，做人口史的比較少。像我做漢江流域研究，用海關資料，就有好幾位學生也用這些資料做他們的論文，不過，我都是讓學生自己選自己想做的題目去做。

我不會指定題目給學生做，我只讓學生念該念的，學生自己想想該做什麼，我看看可以就去做。我不會像有些人是自己想好一些題目讓學生去做。至於我的學生有多少，我從來沒有去算。

我開過幾個人口史與經濟史的會議。經濟所曾經開過兩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會議，第一次是于宗先先生主辦的，過了十年之後，第二次則是我幫忙籌辦。

人口史的會議是這樣的，一九九六年國際人口學會(IUSSP)請我主辦一個研討會，因為國際人口學會下的歷史人口學組想辦一個亞洲方面的歷史人口學會議，他們請我負責主辦。一九九六年在經濟所開會，也是IUSSP的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是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我們開會之後，論文修改之後出了這一本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二〇〇一年出版。在國外出一本書要很久，大概五年才出

來。

問：中研院有三個所在研究歷史，您認為台史所未來與其他的所的關係與發展會如何？

答：台史所現在沒有分組，但有幾個研究群，包括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文化史與族群史。今年我提出一個新興重點計畫，做台灣環境史。其實環境史研究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東西，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爛。只要我們四個群的同仁有意願，都可以做與環境史有關的題目。像我給學生的讀物，這四個群的課題差不多都可以cover到，例如性別與環境就可以做。有一位研究印度有名的學者，本來研究醫療史，但他研究印度也從殖民統治下的各種措施與環境變遷的關係著手。事實上環境史變成是一個更複雜的領域，也使歷史研究變得更難，要做好更不容易。

現在國科會支持我們做一個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來做，GIS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將來要表現空間的意象及情況時就是要用到這種工具。

問：請您談談整合中研院內做歷史研究的部份。

答：今年五月中央研究院開主管會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報，院長每年找我們到外面開一次會，最後一場由院長主持，講到未來發展，就說我們有三個歷史所，要我們回來商量要怎麼辦。

由於每一個所都有五年的中程計畫，初步做法是，我把各所提的重點整理一下，理出十五個大題目，是幾個所都想做的，希望將來做的時候，組成三所都可以有人參加的 team。八月以來，幾個所長每月定期一次聚會談問題，做研究上的整合，但實體上要整合三所並不容易，所以從推動主題研究整合做起。

問：學術界中做到很久且又有成就、能廣被肯定的女性很少，您有沒有在性別與工作發展上遇到什麼兩難的問題？

答：性別對我不是那麼重要。我進到中研院時，人文領域只有三個女性，近史所的王萍、史語所的桑秀雲和我，桑秀雲在前陣子過世了。我在一九六六年進到史語所，是人文領域中第三個女性研究者。但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我一九七四年回到中研院，女性也不多，十年後就越來越多，現在中研院裡面的女性研究者蠻多了。大家當時也沒有特別把我看成是女性，我在經濟所時，早期女性研究人員也不多，我們就這樣子啊！沒什麼特別。

當時從中央研究院出國留學，可以留職留薪四年，我沒有要求留薪，只有留職，超過四年之後（編者按：劉院士在哈佛待六年），我才從哈佛回來，他們就認為我的名額已經沒有了，所以當時屈萬里所長幫我跟美國文化研究所講，跟陳奇祿先生講，他就安排我到美國文化研究所去，所以我一九七四年回來，第一年是申請青輔會對歸國學者的贊助經費，第二年才是院裡專任副研究員，我第一年是約聘。

當時政大校長李元簇先生也曾問我要不要到政大，不過我還是希望回研究院，所以就到美國文化研究所。陳奇祿先生跟我說沒關係，因為美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當時都是跟台大合聘較多，只有我一個人整天在那邊，所以我就負責編輯《美國研究》。

問：您有很多女學生，她們有可能在回家之後的家務負擔也很大，所謂的「second shift」……

答：他們要自己調整時間，我雖然沒有結婚、也沒有家累，而且我母親都幫我做家事。但是她在一九九三年初車禍成為植物人之後，我也要調整我的生活，雖然後來我姐姐幫我一年多，但不能因為這樣就擔誤上班時間，我照樣一

大早就來上班，五點才回去。

女性不要因為家務就擔誤工作，必須自己調整，家務不應該作為excuse，必須要有這樣的態度，不能因為是女性要照顧家庭跟育兒就擔誤工作，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答：我覺得敬業、樂業最重要，既然要做學術研究，除了敬業、樂業要還有什麼解決方法呢？有問題時要設法解決找到出路。我從來不鬧情緒，鬧情緒就無法每天正常工作。隨便鬧情緒，我想是不太好的。

問：在學術生涯上，您會給其他年輕學者什麼建議呢？

簡 歷

姓名 生日 出生地	劉翠溶 民國30年（1941）12月5日 臺灣彰化	
學歷	1963 學士 1966 碩士 1970 碩士 1974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哈佛大學遠東區域研究 哈佛大學遠東歷史與語言組
經歷	1966/8-1968/8 1974/8-1978/10 1976/9-1977/6 1977/9-1979/7 1978/1-7 及 1979/1-7 1978/11-1979/7 1979/9-1980/8 1980/11 1984/1-12 1989/4-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美國賓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私立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訪問教授 美國喬治城大學訪問教授、傅爾布萊特訪問學人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訪問教授
現職	1979/8-迄今 1980/8-迄今 1998/8-2001/10 2001/10-迄今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98/8以後和聘）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與中研院合聘）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 中央研究院臺灣使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榮譽	1996	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領域		經濟史、人口史、環境史